

譯文也由於經過了尤陳俊的校對而文從字順，甚至文字風格趨向統一，在如今譯著品質參差不齊的時代實屬難得。本書的面世，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尤陳俊的奔走和辛勤工作，在此也對他及諸位作者和譯者、校者致以敬意。

陳博翼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

**錢昕怡，《近代日本知識分子的中國革命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6，iii，201頁。**

近代日本對中國的影響之深不必贅言。中日學者對兩國關係的研究也頗為豐碩。這些研究成果從集中於政治、外交的層面，逐漸轉向制度、文化與思想方面。這使學界注意到了兩國關係間多面、多元的特點，也揭示了中日關係研究中仍有不少缺乏關注並值得深入探討之處。錢昕怡的《近代日本知識分子的中國革命論》一書，所研究的對象是日本思想史中常見的幾位人物，但其關注的重點亦是歷來缺乏深入探討的內容之一。此書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外國語言文學學術論叢」之一部，以日文寫作。著者是日本京都同志社大學的政治學博士，其學位論文《近代日本の知識人と中國ナショナリズムの展開—辛亥革命から満州事変へ》（《近代日本知識分子與中國國家主義的展開——從辛亥革命到滿洲事變》）正是此書的底稿。著者對日本知識分子的中國觀已關注多年，此書可謂是集其精華而成之作。

從此書探討的對象來看，著者選取了辛亥革命之後到九一八事變以前，「近代日本知識分子」中具代表性的人物。他們分別是大隈重信、永井柳太郎、吉野作造、堺利彥、山路愛山、長谷川如是閑和山川均等人。著者所討論的是他們對中國辛亥革命及其後的歷史之看法，但他們的中國革命論必然基於「日本知識分子」的立場，並直指日本社會的歷史和現狀。

此書的序言闡明了著者的問題意識。在著者看來，「國家主義」（ナショナリズム、Nationalism），是近代史中非常重要的概念之一，從某種意義上說，近代中日關係就是兩國相互間以國家主義為軸而產生的互動、較量的歷史（頁1）。日本知識分子以日本國內各大媒體為舞臺，所展現出來的對國家主義和中國革命的認識與論爭，反映了在近代民族國家體系內非西方國家知識分子的思想狀況。日本知識分子對中國革命的反應和思考，也有助於

國人從另一個角度認識近代革命和歷史的意義。

第一章重點探討以《新日本》雜誌為舞臺的大隈重信、永井柳太郎，在辛亥革命到護法運動期間對中國的認識和態度，兼論及《新日本》中同具影響力的其他知識分子的中國觀。曾擔任過兩屆日本首相的大隈重信，在中日關係研究中被視為重要的政治人物，但此書將大隈與其他知識分子一同放入思想史研究的層面中，由大隈主持的《新日本》則被視為討論「日支提攜」和中日文明論的舞臺。在著者看來，這一知識分子群體的中國革命論首先是以日本經濟利益為中心的，大隈的「文明論」更是為日本強佔中國經濟資源奠定了理論基礎。在這種並非相互理解、尊重的情況下所倡導的中日關係，必然無法達到所謂「日支提攜」的理想狀況，因此，著者認為此章所探討的知識分子展現的是日本處於「同時被西洋和東洋排斥的兩難窘境」的事實（頁52）。

第二章討論的是一戰到國民革命期間吉野作造的「日中提攜論」。吉野作造被看作是近代中日關係中特殊的存在，在著者看來，吉野更是在辛亥革命之後徹底地支持革命黨，並完全能看見「支那的將來」的少數日本知識分子之一（頁47）。與第一章所探討的《新日本》知識分子相比，吉野的「日中提攜論」對中國展現了可貴的理解和友善態度。著者結合一戰後的國際形勢，以及威爾遜主義對中日兩國知識分子的影響，試圖以動態的過程觀察吉野的思想變化，並尋求吉野的日中提攜論在思想史中的位置。吉野作為「大正民主運動的旗手」以及日中提攜論的代表人物，關於其民主主義思想及其對中國之觀念，並不缺乏研究。著者在此書所討論的問題也許並沒有太多突破前人研究的地方。不過，此章關於吉野的研究十分注重不同時期思想的發展變化，理清了吉野在不同時代隨着歷史環境的變化而反映出的思想流變，同時也指出，即使在吉野臨終之時，這位日中提攜論的號召者仍然沒有找到「中國的國家主義」與「日本的國家利益」之間的契合點。

第三章以堺利彥及他的《新社會》為中心，探討大正時期（1912-1925）日本的社會主義思想，以及「階級」與國家主義的問題。堺利彥是大正時期最具影響力的社會主義知識分子之一，關於階級鬥爭與社會發展之間的關係之探討，是其思想中的重點。在堺的思想論著中，關於中國與中國革命的思考並不多見，但作為日本早期社會主義者之一，堺對社會主義理論向朝鮮、中國的引入起了重要的作用。不過，在著者看來，堺自身對這些鄰近的「弱小民族」的思考卻遠遠不足。這與堺對「民族主義」這一問題的淡漠不無關係。因此，著者引入了山路愛山這位注重「國家之間橫向鬥爭」的知識人與

堺利彥之間的思想論爭，進一步說明作為社會主義思想先鋒的堺，在「民族—國家」問題的思考方面的缺席。本章對堺利彥的思想研究，展示了近代日本社會主義者在對待中國問題時所持態度之一端。

第四章所探討的人物是對中國古典文化及中國歷史持有相當熱情的長谷川如是閑。與前章的堺利彥相比，長谷川對近代中國及中國革命進行過系統而深刻的探討。著者從1920年長谷川對「羅素的社會主義與中國」所展開的探討開始，到九一八事變發生後的「滿洲放棄論」為止，介紹了十年間其在中國革命論中獨特的「國家」與「社會」二元構造理論（頁173）。強調「社會」應該高於並先行於「國家」的長谷川，始終認為中國應該要走資本主義化的社會革命道路。在著者看來，能發現傳統中國的現代意義是其思想中的可貴之處，但其中國革命論始終沒有突破歷史發展的階段論模式。因此，長谷川對近代中國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結構的重視可謂是片面的。但同時著者也指出，長谷川在探討中國問題時對中國社會作出的理解與同情，亦是日本知識人中鮮能做到的。

著者在此書中對以上多名近代日本知識人展開了探討，雖然每一章都可獨立成文，但將其聯繫在一起，則是一個大正前後日本知識分子圍繞中國革命這一問題，而進行的思考和爭論的宏大場面。嚴格來看，作者所選擇的研究對象並不能簡單地合稱為「近代日本知識分子」。因為這些擁有不同身份、背景，站在不同立場上，持有各自政治主張的知識分子，對中國革命的看法都有自己的體系。著者沒有試圖尋找各章節所探討的人物間的內在聯繫，所以也並沒有在此書中真正構成「近代日本知識分子」這一「整體」。因此，此書亦容易讓人產生疑問，即書名中所謂的「近代日本知識份子」具體為何，有何提出的意義？著者雖然在每一章節都進行了具體而深入的思想史研究，但最終回歸到「近代日本知識分子」這一整體時，所作出的努力卻仍有欠缺，這或許亦是近代日本思想史研究者應該留意的問題。

劉慶霖  
中山大學歷史系